



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——长江与中华文明展”展厅实景（朱宇/摄）

大江万古流：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演进与贡献

郭伟民

从万年文化史到五千多年文明史，长江流域不仅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蹒跚起步，更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谱系与社会形态，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。本文从考古学文化进程、社会演进脉络、文明发展进程途径与方式三个维度，回溯长江流域波澜壮阔的文明演进历程。

长江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进程

长江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以新石器时代为核心，时间跨度从距今10000—4000年，中下游地区谱系最为清晰，上游区域虽有探索但仍需丰富。考古学文化作为史前无文字时期的重要标识，融合了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文化遗存与人工制品特征，成为追溯文明轨迹的关键线索。

距今约18000—11000年，是人类文明从狩猎采集向定居生活过渡的关键阶段。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器测年距今约2万年，堪称中国最早的陶器。玉蟾岩还发现了最早的水稻，临澧蒋家垅遗址则出土了距今13000年前的陶片，印证了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与制陶技术的重要发源地。

距今约11000—8000年，钱塘江上游的上山文化是这一时期的核心代表，距今11000—8500年的上山文化早期，已具备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特征，出土了加工稻谷的磨盘磨石、带点状符号的彩陶，也出现了早期墓葬，还发现了水稻田。比上山文化晚约1000年的彭头山文化，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，出现成熟的定居农业形态，房子、墓葬、壕沟等设施完备。距今8000—7000年，长江流域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革，原有文化逐渐被纷纷涌现的新文化类型取代。中游的城背溪文化、皂市下层文化、高庙文化与下游的跨湖桥文化成为主流。中游地区的文化突破尤为显著，比如皂市聚落体现了人类从平原向山区河谷地带迁移的趋势，坟山堡聚落则进入洞庭湖核心湿地；武陵山区的高庙文化以复杂纹饰的白陶为标志，太阳纹、兽面獠牙纹、凤鸟纹等程式化纹饰，推测用于特殊仪式。下游跨湖桥文化则见证了水上交通的发展，出土的独木舟即明证。江西老虎墩遗址同时发现中游风格的圜底陶器与下游的圈足器，确立了江西作为长江文化交汇地带的重要地位。距今7000—6000年，汤家岗文化、柳林溪文化、马家浜文化、河姆渡文化各具特色。河姆渡文化的黑陶、灰陶与中游陶器差异明显，但不少纹饰风格相似，马家浜文化的陶器形态则多与中游接近。距今6000—5300年，长江中游整合为油子岭文化，下游整合为崧泽文化，“油子岭化”与“崧泽化”标志着长江中下游的频繁交流。

距今5300年以后，文化格局进一步扩大，中游屈家岭—石家河文化、下游良渚文化成为核心，中间的皖江辅以薛家岗文化。上游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（距今约4500年）则受到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双重影响。这一阶段，长江流域文化主动北上，屈家岭文化影响范围扩展至黄河南岸乃至晋南盆地，良渚文化则北上主导山东南部部分区域，西进至湘江流域。到了距今4300—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，中原文化开始强势南下，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、下游的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，均明显受到中原王湾三期文化、龙山文化玉王坊类型的影响，长江的中原化趋势进一步强化。

长江流域史前社会演进

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的演进以稻作农业为基础，经历了从简单聚落到复杂文明的完整历程。

饭稻羹鱼的生业经济

以稻作农业为主体的生业模式是长江流域社会的经济基础，从李家岗皇朝墩稻田到茅山稻田，良渚古城莫角山池中寺出土的20多万公斤炭化稻谷、鸡叫城遗址80平方米范围内2.2万公斤水稻加工残屑，证实了4000多年前长江流域水稻生产已具备统筹规划能力，类似“公粮”的储备体系初步建立，也暗示靠配给、供养或交易水稻的非农业人员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。

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

社会复杂化的核心标志是聚落形态、社会分层、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。在聚落形态方面，长江流域经历了“村落—环壕聚落—城壕聚落”的演进路径：城头山古城（距今6300—6100年）、斗山古城（距今6000年）已具备完整的城墙与护城河，良渚古城、石家河古城更是具有多重壕墙布局、明确的功能分区、专门的贵族墓地与宫殿区、大型水利工程，形成了成熟的王权文明。上游成都平原的古城则晚于中下游，鱼凫古城、宝墩古城等仿照中下游筑城技术，融合黄河流域陶器工艺，成为文明交汇的产物，为三星堆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

精神文化方面，图像艺术与祭祀遗存成为其核心内涵。上山文化彩陶符号、高庙文化白陶的程式化纹饰，掀起史前第一次艺术浪潮，太阳纹、八角星纹、兽面獠牙等成为跨区域共享的文化符号。祭祀遗存丰富多



新石器时代高庙文化亚腰罐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（江芬摄）

样，石家河印信台的套缸、三房湾巨量红陶杯、陶塑动物、人偶与彩陶纺轮，下游地区的大量玉礼器，共同构成了早期信仰体系。凌家滩遗址200多件玉器的墓葬、良渚反山墓地的奢华玉器，彰显了等级分化的极致，玉器作为礼器成为权力与信仰的载体。

长江流域史前文明进程的途径与方式

长江上、中、下游因地理环境与文化基础的差异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发展路径，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。

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发展有起伏、重组，本土传统融合外来文化，连续发展的谱系和序列比较清晰。核心途径是以稻作农业为支撑，以血缘家族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，聚落从村落、环壕聚落到城壕聚落的演变呈现超稳定特征，部分遗址持续发展数千年。城头山、石家河古城的防洪排涝设施，鸡叫城的三环水渠系统，体现了通过公共事务凝聚权力的模式。在发展方式上，中游社会分化相对温和，军权与神权未完全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，战争迹象不明显，古城国林立，呈现“大分散、小聚居”的格局，石家河古城虽为权力中心，但与其他城址可能属于联盟关系，尚未形成一统天下的最高统治者。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持续融合，使长江中游文明保持了绵延不绝的生命力。

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是原生文明，作为长江下游的核心，虽以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为基础，但受外来文化刺激产生“文化裂变”，属于原生文明的突破性发展。其文明化途径以稻作农业为基石，通过文化碰撞催生文明飞跃，以玉器为通神载体，将信仰转化为权力。在发展方式上，下游文明更具主动性，大规模修造城池与水利工程，通过治水强化指挥与管理能力；推行“造神运动”，以玉器制造与使用确立礼制秩序；形成“定于一尊”的权力结构，通过资源再分配控制周边区域，构建了神权、军权、王权结合且以神权为主导的文明模式。良渚文明虽有断裂，但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，成为文明演进的重要典范。

长江上游史前文明是次生文明，川东重庆地区与成都平原的文化均以外来因素为主。成都平原最早的桂盟桥文化源自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，筑城技术则借鉴自长江中游，文化与文明因素多为外来输入。这一区域的神权与王权特征尚不明显，与三星堆文明形成鲜明对比，凸显了文明交汇地带的独特性。

长江史前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深远贡献

长江流域史前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稻作农业的成熟确立了“南稻北粟”的农业格局；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模式，延续至今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；从环壕聚落到城壕聚落的演变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，引领了文明的发展方向。

高庙文化—良渚文化—肖家屋脊文化掀起了史前艺术浪潮，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观念的源头；干栏式建筑、丝绸、漆器、舟楫等发明创造，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。

长江流域文明的稳定性与连续性，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活化石，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：“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，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，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。”

（作者单位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）



视点

文脉守正 迁徙寻根

——三峡张飞庙搬迁方案论证与决策纪实

朱宇华

在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的宏大进程中，文化遗产保护始终是关乎历史传承的重要课题。云阳张桓侯庙（俗称“张飞庙”）作为三峡库区标志性文物古迹，因三峡水库175米最高淹没线面临灭顶之灾，张飞庙易地搬迁项目成为国家重大工程背景下文物保护的关键实践。自1993年至1999年，历经六年多的反复论证，先后开展了“原址靠后”“迁入新城”“随城迁移至南岸”三种搬迁方案的讨论，历经多方论证最终形成的“随城迁移至南岸”的科学决策，不仅挽救了一座千年古刹，更构建了文化遗产保护“价值保护、多方协同、文化传承”的中国范式，为同类工程提供了宝贵借鉴。

千年古刹的价值基底：不可复制的文化坐标

云阳张桓侯庙坐落于重庆云阳县长江南岸，紧临长江水道，与云阳老城隔江相望，自古便有“巴蜀一胜景”的美誉。作为“文藻胜地”，庙内珍藏木刻书画281幅，其中王羲之《兰亭序》摹本与颜真卿《争座位帖》摹本书法木刻并称“双璧”，岳飞手书《出师表》、黄庭坚《幽兰赋》、苏轼《赤壁赋》等，构成了完整的古代书法艺术实物谱系。

在价值维度上，清华大学吕舟教授指出，除了具有文物古迹普遍的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三大价值之外，张飞庙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是其“文化价值”的核心：其一，它是长江三国史迹文化链的关键节点，与白帝城、石宝寨等景点串联，构成三峡地区独有的三国文化景观带；其二，它是三峡人文景观线的核心标识，“依山而建、藤萝掩映”的建筑格局与长江水道形成“山—水—庙”共生的生态景观，体现古代“天人合一”的营造智慧；其三，它是云阳民俗信仰的精神载体，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其为“张王庙”，“张王爷隔江守望”“百姓隔江祭拜”的习俗延续千年，每逢张飞生日的庙会活动、百姓过江祈福活动至今传承，使庙宇深度融入地方生活，成为三峡地域共同的精神纽带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张飞庙的文化价值与长江水道、云阳县城三者形成不可分割的空间关联。这种“庙临江、城相望”的格局历经千年沉淀，成为其文化价值存续的物理基础。根据《长江三峡库区云阳县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》，云阳老城将整体迁移至上游32公里处的双江镇（长江北岸），张飞庙也位于淹没线以下，因此易地搬迁成为唯一选择。但“如何搬迁、迁至何处”的核心问题很快引发了关于保护理念的深度探讨：文化遗产的保护，是优先保留原址的地点真实性，还是延续文化价值？这一命题贯穿了整个保护方案论证过程。

三种搬迁方案博弈：数据支撑下的优劣权衡

随着云阳新城搬迁规划的确定，张飞庙如何搬迁前后出现三种方案。各方围绕工程可行性、文化价值延续性、投资成本等维度，结合实地勘查数据与多方诉求展开密集论证，每一种方案都呈现出鲜明的优势与局限。

原址靠后方案：原址真实性与文化割裂的两难抉择

“原址靠后”方案由吕舟教授于1993年在《长江三峡淹没区文物保护论证——云阳张桓侯庙的保护论证》中首次提出，核心思路是将庙宇在原址淹没线以上的180至210米高程处，向后抬升50米复建，保留其在长江岸线的地理坐标。

该方案的核心优势集中在成本可控与原址真实性两方面：搬迁距离最短，可节省大量运输与工程费用，契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（简称“三建委”）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》“移民任务和资金包干”原则，投资成本低，成为工程建设方的优选；保留了原古迹所在自然环境的真实性，长江水利委员会在《张桓侯庙迁移保护规划设计报告》中指出，该方案“尊重‘此物在此地’的历史认同，符合文物古迹原址保护的原则，最大限度保留文物真实性”；技术可行，经勘察原址靠后的位置无重大地质缺陷，高边坡和库岸再造问题可通过工程手段解决。

但是该方案一出台，就遭到云阳当地百姓的反对。当地政府明确提出，张飞庙属于云阳县城，响应国家移民规划，云阳县城全部搬迁到上游32公里的双江镇新址，张飞庙也要和全县百姓一起移民到新址。

文物保护专家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也充分理解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张飞庙作为故土记忆的象征，若不能随城搬迁，将引发地方群众的广泛不满。因此，虽然三峡投资方和文物保护专家都认可“原址靠后”方案，但在最终结论中亦明确表示“若各方面同意其他方案，不提出异议”。

迁入新城方案：规划刚性与环境适配的现实冲突

“迁入新城”方案源于《三峡移民安置规划》中明确云阳县全县整体搬迁的刚性要求，新址双井寨附近就预留了张飞庙规划重建的用地，并与磐石城、双井寨等原古迹共建成一个文化旅游景区，该方案最早



施工现场

公布后，得到了重庆市移民局和云阳县政府的支持。此方案的优势在于规划协同性：契合国家移民安置的整体布局，方便群众祭拜与日常管理；古迹集中可形成文化集群效应，带动新云阳城的旅游经济发展。

但1996年清华大学《四川省云阳县张桓侯庙保护规划报告》与1998年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实地勘查数据，彻底否定了该方案的可行性：其一，选址环境不适配。双井寨区域狭窄，背后无高耸山峰作为衬托，与原有临江高挂的张飞庙风景大相径庭，没了气势。其二，建筑形制无法还原。张飞庙原位于长江南岸，坐南朝北，若迁至长江北岸的新城，为保持大门朝西的方位不变，将形成“镜像”的沿江立面，而古建筑解体后无法按“镜像”复原，从古建筑构件材料、原做法和工艺来看，不具备可操作性。

由于在长江北岸复建，无法满足张飞庙“背山面水、再现原址环境”的选址原则，且建筑朝向与格局真实性难以保障，该方案最终被重庆移民局和云阳当地政府否决，体现了建设规划服从“不改变文物原状”的保护原则。

南岸迁迁方案：文化延续与环境复原的最优选

在两种方案受挫后，清华大学随后提出的“随城迁移至长江南岸”第三方案逐渐成为共识。该方案跳出“留原址”或“进新城”的二维思维，核心是在新县城对面的长江南岸勘察选址，与北岸云阳新城保持“隔江相望”的历史空间格局，最大限度延续文化价值。

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得到多重数据与论证支撑：其一，空间关系延续。张飞庙与云阳老城、长江水道形成的“庙临江、城相望”格局已延续千年，清华大学1996年《四川省云阳县张桓侯庙保护规划报告》明确指出，该方案“基本出发点是保持这一历史空间关系，虽失去原址真实性，但再现了文物原有大的历史空间与环境特质”。其二，专家们共识高度统一。陕西古建筑设计研究所专家认为，张飞庙的价值集中在“蜀汉历史见证、长江历史印记、建筑与环境融合、民俗文化载体”四方面，南岸迁迁方案最能体现这些价值。其三，技术与实操可行。该方案背靠一座大山，“能最大限度再现原有历史环境特征，便于划定保护范围、日常管理及长江三峡风景线布局”，并确定“背山面水”的选址原则。其四，方案细节明确。1997年12月，清华大学规划组在长江南岸的盘石镇确定新址，1999年编制《张飞庙搬迁保护规划方案设计》明确张飞庙搬迁工程的两大保护原则：古建筑本体工程“原拆原建”，环境工程“再现历史环境”，确保建筑形制与历史景观格局的完整性。

1999年，国家文物局以《关于对白鹤梁题刻、石宝寨及张桓侯庙保护规划方案的意见函》（文物保函〔1999〕160号）正式批准该方案，历时6年的论证终获定论。

决策内核：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时代突破

回顾三峡张飞庙搬迁的决策过程，本质上是我国文物保护理念从跟随西方“物质遗产保存”转向中国“价值传承保护”理念探索的一次重大实践。这一决策不仅基

于翔实的实地勘查和各方面的专业论证，更蕴含中国特有的文物保护的三重核心理念，与当时流行的西方国际保护理念交融共振。

价值引领：文化价值成为决策核心标尺

决策过程中，各方逐渐形成共识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仅停留在建筑本体，更要守护其承载的历史文脉与情感联结。张飞庙的突出价值并非古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，而是其在长江三国文化链、三峡人文景观线、云阳民俗信仰中的核心地位。南岸迁迁方案之所以胜出，关键在于其最大限度保留了“庙—城—江”三者历史空间及文化关系，这与1994年ICOMOS奈良会议拓展的“真实性”理念高度契合——真实性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材料、工艺，更涵盖文化层面的传统、习俗与情感。而这—具体实践比2005年ICOMOS《西安宣言》首次明确文物古迹“周边环境”具有保护意义早了6年之久，成为我国文物古迹“背景环境”保护实践上的重要案例。

数据支撑：科学论证奠定决策基础

三个方案论证过程始终以现场勘察为基础，以科学数据为核心支撑：从原址山体35度坡度选址、岩石风化程度相似等地质数据，到新旧位置的游客量、门票收入等经济数据，再到建筑朝向、古建修缮工艺、“庙—江—城”空间格局关系等数据，为方案优劣判断提供了量化依据。例如，通过对比三种方案的工程成本、景观还原度、文化价值等三方面指标，清晰论证了“南岸迁迁方案”的综合优势，避免了决策的主观臆断，体现了文物保护的科学精神。

多方协同：构建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

决策过程形成了“专家论证、政府决策、群众参与”的协同模式：清华大学、陕西古建筑设计研究所等专业机构提供学术与技术支撑，重庆市移民局、国务院三建委统筹政策与成本，云阳当地群众反馈情感诉求。不同立场的充分兼顾，使决策既满足了工程可行性与成本控制，又凸显了“文化价值”核心驱动、本体“历史价值”真实保留，这种多方协同的机制，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。

文物保护的中国实践与传承

如今，搬迁后的张飞庙依然矗立在长江南岸，与云阳新城隔江相望，“巴蜀一胜景”的风貌得以完整传承，庙内281幅木刻书画全部妥善保护，年游客量仍占据三峡游总人次较高比例。

从张飞庙的易地搬迁，到应县木塔的数字化保护、绍兴古城的智慧管控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正从“抢救性保护”向“预防性保护”、从“物质保存”向“价值传承”、从“单一保护”向“系统治理”不断进阶。张飞庙的搬迁故事，不仅是一段文物迁徙的纪实，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生动注脚——唯有坚守文脉根魂，兼顾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，才能让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永续传承，绽放出持久的魅力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建筑大学）



三种选址方案